

《阅微草堂笔记》由清代纪昀历时9年（1789—1798年）写成，共24卷，包括《滦阳消夏录》（6卷）、《如是我闻》（4卷）、《槐西杂志》（4卷）、《姑妄听之》（4卷）和《滦阳续录》（6卷）。1800年由其门人盛时彦校订合刊，定名为《阅微草堂笔记》。该书取材广博，举凡京师风尚、风土人情、官场变幻、世态炎凉、边地民俗、医学占卜、逸闻趣谈、家庭逸事、鬼狐精怪，几乎无所不包，其中既有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也有道听途说的，叙述尚质黜华，又天趣盎然，与《聊斋志异》并行海内。书中那些闹里市井之间的家长里短，无不显示了著者匡时救世的婆心；而以“神道设教”作为创作根本出发点，也使得该书成为一部普及儒家伦理的生动教本。

测鬼神之情状，自然成趣

纪昀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的目的首先在于劝世，字里行间浸润着浓烈的伦理色彩，试图由此唤醒人们对既定伦理规则的认同感，并能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作为一种道德期待，该书希望读者能通过道德自律回归上古理想世界。为了表达劝善惩恶思想、使道德训诫更直观、更时尚、更能吸引读者，作者以鬼狐精怪为主角，借助民间关于鬼神形象的想象进行小说创作。全书内容诡谲奇谲、汪洋恣肆，其中涉及狐仙的故事多达130余篇。本书中这些狐仙多继承前人作品中狐善于变化的特性，例如《槐西杂志三》记载，一众学童性情顽劣，经常污秽狐的居所，狐趁老夫子外出之际，幻化成他的模样，“各挞之流血”，狠狠地惩罚了这些顽童。狐多聪慧，口齿伶俐，颇具“狐性”。《滦阳消夏录一》记述，一狐女劝导书生戒色，曰“声色之娱，本雷光石火。岂特吾肖某某为幻化，即彼某某亦幻化也。即千百年来，名姬艳女，皆幻化也。将“色即是空”之佛理阐释得鞭辟入里。

同时，《阅微草堂笔记》中的狐又具特点，有异于他书之处。首先，多是“正义之狐”，即使“为恶”，似也有情可原。如《如是我闻三》记述，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言鬼神不信鬼神

□ 张颖慧

某童子为狐所祸，经正乙真人问询，方得知童子某世为僧，狐为女子，路经寺庙，为僧所拂，受辱十七载，故有后世的报复。其次，狐不以媚媚人，多知书达礼，自尊自爱。《滦阳续录三》记述，狐女温玉，因仰慕董太士的高尚德行，自荐为妾，却不共婣，避免“以贱体玷公”。此外，狐多通达惜道，深谙事理。《如是我闻三》记述狐委婉劝告主人不应“厚结盟之兄弟，而疾其亲兄弟”，“厚其妻前夫之子，而疾其前妻之子”，说理精辟，主人惭愧至极，无法应答。

形虚神实，有益于劝惩

纪昀虽言鬼狐，却对鬼神之存在持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对鬼神的描述也多借他人之口。《如是我闻二》中，作者就“凶煞”问题论道：“顾自古及今，丧丧者恒河沙数，何以独示兆于是夜？是夜之中，何以独示兆于是地？是地之中，何以独示兆于数家？其示兆皆擲以鹅鸭，又又何所取？鬼神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存而不论可矣。”究其实质，《阅微草堂笔记》旨在以鬼狐抒己见，以有益于人心。恰如纪昀在《滦阳消夏录一》中所指出的：“小说裨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故纪昀笔下，鬼之形状多基于生前作为。比如，《姑妄听之四》记述，因生前“巧于应对，谀词颂语，媚世悦人”，而有“鼻下无口”之鬼，无口，“使不能语”。生前“城府深隐，人不能测”，死后便“自胸至腹，裂罅数寸，五脏六腑，虚无一物”。借鬼神规时范

世、劝顽惩愚，才是《阅微草堂笔记》的关键所在。

作者尤擅官场劝惩，这与作者本身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纪昀系直隶河间府（今河北献县）人，其家世谱系详见于《景城纪氏家谱》。纪昀天资聪颖，少年即目逾万卷、心有千秋，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任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后累官至礼部尚书、《四库全书》总纂官。一生居官清要、宦途通显，嘉庆帝御赐碑文“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卒谥“文达”。浮沉宦海数十年，纪昀深谙官场内情，并试图揭示其“恶”。纪昀笔下，官场的恶既有贪官之恶，也有清官之恶。《滦阳消夏录四》记一县令不能决断一杀人案，乃“折梦城隍祠”，根据梦中所示，判一“祝”姓者、一名“节”者为罪犯，结果发现误判。《滦阳消夏录六》更是借冥吏之口指出，“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唯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刮膏，吞声泣血”。这些都深刻揭示了封建官宦场域贪财害民的罪恶本质。纪昀对清官的剖析更为人称道。《滦阳消夏录一》记述一清官“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阎王讥笑他说：“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清官认为自己十分廉洁，顶多饮百姓一杯水，所以面对阎王硬气得狠，却受到阎王的嘲讽：如果以不贪财为好官的评判标准，那不如把一个木偶放公堂上，因

为木偶连百姓的水都不用喝。清官又辩解道：“某虽无功，亦无罪。”阎王斥之：“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对于官员来说，避繁就轻，但求自全，虽廉洁，亦有罪。《如是我闻三》中也记载，一清官自称“存心忠厚，誓不敢妄杀一人”。冤魂斥责其“以纵恶为阴功”，使恶人漏网，危害更多的好人，算不得好官。书中这些故事，直到今天，也还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值得世人特别是为官者深思。

不喜“道学”，敦实笃厚

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就了一批“假道学”。康乾之际，统治集团对此类文人深恶痛绝。纪昀对此也多有论述，并分别斥之。鲁迅先生评论说，“书中有触即发，与见于《四库总目提要》中者正等”。其一，嘲讽“假道学”之“虚”。如《滦阳消夏录四》记述，一乡宦自称“道学”，国家危难之际，“道学”不知救国，却沉湎于高谈阔论，遭到狐精嘲讽：现在周边饿殍遍野，你为官，不想着改变现状，施舍粥药，反而在这虚谈高论，不知你讲至明天天亮，那些内容能不能当饭吃，当药服用呢？其二，抨击“假道学”之“恶”。同卷记述两个“以道学自任”的塾师，邻村而居，一日相邀会讲，“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结果从天而降一纸，乃是二人谋夺寡妇田地的往来密札。“假道学”虚伪且丑恶的面目跃然纸

上。其三，批评“假道学”之“迂”。《姑妄听之四》记述，一腐儒见魏三之子并边嬉戏，魏三妻子在旁边熟睡，不知孩子危险。此腐儒本可叫醒魏三妻子，却碍于“男女有别”，“雅步市上”，到处寻找魏三，致使魏子落井而亡。作者痛斥道，读书是为了明理，明理是为了运用，读书而不知道运用，昏聩僻谬至此，产生了那么大的危害，这种读书人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呢！纪昀对宋儒等空谈文人的讽刺，虽是顺应时代潮流，但思想开明、见解通达，常见忧国忧民之情怀，受到世人称赞。

发人间幽微，洞察世情

除却官场、文场，《阅微草堂笔记》同样彰显民间苦难、风土人情、处世哲学等人生百态。其一，反映民生疾苦，近乎正史。《滦阳消夏录二》记明朝崇祯年间，山东、河南遇蝗灾，草根木皮皆尽，出现了以人为食的惨状，一些妇女、儿童被买来去，“如刳羊豕”。《如是我闻二》也有类似的记述。将天灾人祸下生民之悲惨呈现纸上，作家退去小说家言，尽力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其二，哀女奴之遇，悲烈女之志。封建社会崇尚男尊女卑，妇女经常受到欺压，纪昀作为国之重臣，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悲惨遭遇充满同情。《槐西杂志二》记述了女奴住在某官宦之家的受训三部曲，“凡买女奴，成券入门后，必引使长跪，先告诫数百语，谓之教导；教导后，即褫衣反接，扞百鞭，谓之试刑。或转侧，或呼号，抵甚甚。扞至

不言不动，格格然如击木石，始谓之知畏，然后驱使”。手段残忍凶狠，揭示了当时官宦之家女奴的悲惨遭遇。此外，纪昀对节烈女子充满敬佩。《槐西杂志二》写一对夫妻因饥荒被活活拆散，女子寄希望于与丈夫再次团聚，隐忍苟活，成为一官员的姬妾，却在得知丈夫已死的消息后，跳楼而死。此类壮烈女子，其他书卷中也常有论述。其三，歌颂孝道。纪昀对孝顺之人多有称赞，如《滦阳消夏录一》记述，沧州举人刘士玉家的一间房子被狐精占了，担任知州的董思任听说后，亲自来驱逐狐精，却遭狐精嘲讽：“公为官颇爱民，亦不取钱，故我不敢击公。然公爱民乃好名，不取钱乃畏后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言取困。”董思任爱民，且不贪财，本是好官，却不想被狐精挖出了其“好名”且“畏后患”的“私心”，董思任惭愧至极，狼狈而归。刘士玉的一个女仆却不怕狐精，狐精也不打她，问狐精缘由，狐精说，这女子虽然身份卑微，却是真正的孝顺，鬼神见她都要退避，何况我呢？刘士玉让这女仆住在房子里，狐精当天便离开了。此外，作品中也不乏对人生哲理的论述。如记述了两例“心定则外邪不干”的故事：《滦阳消夏录一》中写道，曹竹虚的一位族兄住朋友家，因地处荒僻，夜见狰狞女鬼，曹兄不惧，终使女鬼羞愧而逃。纪昀指出，“不畏则心定，心定则神全，神全则涉戾之气不能干”。《滦阳消夏录三》也有类似记载：一农村少妇名荔姐，夜路遇恶人，危急时刻，沉着冷静，迅速躲到坟墟之后，披发吐舌，瞪目直视，恶人被吓到，荔姐顺利逃脱。

《阅微草堂笔记》叙事说理以儒学为宗，行文怡然悠然，兼具老庄之豁达，又不乏佛理阐释，作品饱含诗性智慧，使人见微知著。面世之后，拟作纷起，如《耳食录》《闻见异辞》等，不一而足，影响甚为深远。



清末知县焦云龙的“不饮『贪泉』”

□ 郝重庆

光绪七年（1881年），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了时任陕西省三原县知县焦云龙勤政爱民的感人事迹，称赞他“公在池阳，视民如伤，五日在城，五日在乡”。远在陕西的一名知县能被《申报》所关注，这在民初启启的年代是极为罕见的。据杨虎城主持修撰的《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焦云龙1840年出生在山东淄博，1874年中进士。后任陕西省米脂、三原、富平、长安、咸宁等县知县，绥德、商州知州，潼关厅抚民同知。焦云龙在陕西为官27年，所任之处皆留下极佳的口碑。

（一）

“立志由来不爱钱，居官切莫饮贪泉”，焦云龙常以诗言志，以志砺行。自1875年赴陕任职以来，焦云龙确实做到了衙清如水、清风两袖。焦云龙在汉中负责茶税工作时，没有中饱私囊而是还利于民。原本税务部门在征收茶税、布税等正税之外，还要征收各种杂费，以做部门私利。焦云龙力排众议，革除陋规还利于商贩。每月还会从俸

禄中拿出一些钱，救济贫寒山民。有一年春节，焦云龙为税务官署正门撰春联“立志应如磐石固，居心要比汉江清”，以明心志。

爱民是为官之本。焦云龙认为，“自天子至于守令，皆当以爱民为第一要义。”。1878年，焦云龙出任三原县知县。据《三原县志》记载，焦云龙经常四马单车周历乡村，访贫问苦。他每次出行都会随身携带糖果和饼子，遇到小孩就分赠一些，遇到老人则围坐一起话家常，百姓亲切地称其为“焦老爷”。焦云龙在诗中记述道，“五日居城五日乡，每招父老话衷肠，家家孝悌尊亲长，此是人间第一章”。焦云龙在三原县任职4年多，物阜民丰，社会安定祥和，监狱里没关押过一个罪犯，留下了“年丰官舍闲，图圉生芳草”的历史佳话。

焦云龙曾主持过两次赈灾，救助灾民无数，赈灾成绩卓著。光绪三年（1877年），陕西、山西等地遭遇极端旱灾，陕晋两地“赤地千里，人相食，道禁相里，抛女弃男，指不胜屈，为百余年来未有之奇”。焦云龙初到米脂任上，面对“天灾似火地如烧，四野禾苗并土焦”的灾情忧心如焚，他哀叹道，“百呼上苍无一应，徒叹心血积盈瓢。”焦云龙积极向朝廷申请救助，朝廷只下拨了一万两赈灾银。用这点钱应付天灾，简直是杯水车薪。他只好带领8万灾民开展自救，积极发动乡绅捐粮捐款。同时开设育婴局，喂养和收留孤儿。焦云龙在米脂的赈务被评为全陕西第一。

1900年，陕西潼关一带亦遭遇旱灾。焦云龙被任命为潼关厅抚民同知赴潼关赈灾。焦云龙到任后就迅速赶往省城，请求上级援助赈灾。在得到上级允准后，飞速赶回潼关打算开仓赈灾。管理粮仓的官员因还没接到上级命令，拒绝开仓。焦云龙当即表态，“罢官抄家所不恤矣，但求民得活耳”。在焦云龙极力争取下，官仓得以尽快放粮，救活灾民无数。

（二）

焦云龙以名进士宦秦，历任七县、三州，均以崇文重教为第一要

务。他在陕西27年，兴建了十几座书院和上百所义学，对当地文教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一些教育文化遗产直到今天还焕发着鲜活生命力。

据1907年刊印的《米脂县志》记载，焦云龙任米脂县知县时，看到建于乾隆年间的固川书院墙倒屋塌，亟待重修。他率先捐出养廉银600两，为书院盖讲堂5间、过厅5间、前后厢房4间，将县试考院设置于此。此外，还筹集了数万两银子作为教育基金。这笔基金除了用于支持书院发展外，还用于学子参加乡试、会试的补助。参加乡试者每人奖励7两银子，参加会试者每人奖励50两银子。看到米脂文教事业日益振兴，焦云龙欣然写道：“束脩膏粱亦从丰，秋试春闹路费充，自此寒儒争奋进，群英破浪尽乘风。”

焦云龙任三原知县期间，与名儒贺瑞麟的交往堪称佳话。三原学者贺瑞麟是名震西北的理学家和教育家，焦云龙对贺瑞麟非常仰慕。在政务之余，经常造访清麓精舍，向贺瑞麟请教为学为官之道。贺瑞麟对焦云龙也是期许有加，称赞焦云龙“洁已爱民，近世罕见”，鼓励他向历代名臣看齐。焦云龙认为贺瑞麟的鼓励是对他莫大的精神支持，他给贺瑞麟回信道，“昨登清麓问安，荷先生不鄙，特赐《名臣言行录》一部，仰见先生望我者，大爱我者。甚固以名臣相勉。但云龙自觉循良身份尚够不到，何况名臣”。

据光绪版《三原县新志》记载，焦云龙捐银千两，支持贺瑞麟将清麓精舍扩建为正直书院，增加了5间讲堂、10间宿舍和3孔藏书洞。此外还拨水田、果林若干亩，作为正直书院日常经费来源。焦云龙还支持贺瑞麟整理刊刻了《清麓文丛》《原献文录》《原献诗录》《三原县新志》等上百种书籍，影响遍及西北地区。正直书院也在贺瑞麟的主持下，英才荟萃，声誉日隆，后发展成为陕西著名书院。

焦云龙在长安知县任上，捐廉备奖支持关中书院，倡建冯少墟书院，修建鲁斋书院和崇化书院，整修汉儒董仲舒祠，支持刊印《春秋繁露》多部。在富平知县任上，整修明朝忠臣杨爵祠堂，整理刊印了

杨爵的《斛山文集》。

（三）

焦云龙居官多年，克己奉公，清白遗家。他写信给长子焦振沅，“自古勤俭成家，懒惰废业，理之常也。尔当率尔兄弟，加意诵读，尤须以俭朴勤苦为第一”。焦云龙鼓励子女要以成为真儒、名宦为志向。他在家书中写道，“尔祖父未给我留下多少家业，却以清白传我，所以我才能自立并济人。你们要继续坚守清白传家的祖训，要以‘处为真儒，出为名宦’为己志”。受清白家风的影响，焦家子弟均能立志高远、艰苦奋斗。焦云龙长子焦振沅成就斐然，先后担任陕西省紫阳、武功、旬邑、神木等县知县，皆能勤政为民。

万里波涛接瀛海，千年豪杰壮山丘。1901年六月十五日，焦云龙积劳成疾，病逝在潼关任上。焦云龙去世后，来潼关署中吊唁者十几日不绝，有些人甚至从河南、山西远道而来。关中大儒牛兆濂赞写道，“爱民如子，利民心长，公殿民号，万家如霜”。据《潼关县志》记载，焦云龙家中素无余积，去世后家人无力安葬。在潼关道台谭启瑞资助下，才得以安葬在潼关东山。潼关百姓还自发修建了焦公祠，上书楹联“满原共拜仁人赐，合社均沾雨露恩”，并于每年二月二十六日举行庙会，以纪念焦云龙。据《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陕西大吏以云龙政绩卓著，疏请宣付史馆立传，并列入循良，得旨允之”。在潼关绅民强烈呼吁下，陕西巡抚曹鸿勋将焦云龙的事迹奏请朝廷。朝廷准奏，命国史馆为焦云龙列传。

视民如有伤，斯民才不忘。焦云龙在陕西为官27载，遗爱满三秦。时至今日，陕西潼关、阎良等地百姓每年还会组织各种纪念活动，感念和缅怀焦云龙。



（上接1版）

世界上任何一项伟大工程，都不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大功告成的，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要求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就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管党治党建设党的问题，保持历史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全党学习党的历史，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强调全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调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正是体现了这一要求。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所要完成的任务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但党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初心使命没有变，贯穿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的整体设计思路和基本要求没有变，这就是我们今天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坚实基础。

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要求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还需要我们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中认真把握各项工作的连续性、把握各项工作之间的有机衔接和逻辑自治。目前，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面对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千头万绪，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要要求我们严格按照体系化要求，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有序推进，谨防急功近利，谨防形式主义，不管在哪个层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每一项重要举措都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从论证设计到具体实施、考核验收，都要特别注意工作自身的内在一貫性，注意此一工作与其他工作之间的前后衔接关系，注意工作的连续性。只有这样久久为功，才能使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真正一步步推进。这意味着我们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党的建设推进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要构建到哪里，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党的建设各方面；坚持对象上全覆盖，从严抓领导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各级党组织建设，重点是抓好“关键少数”；坚持责任上全链条，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制度上全贯通，用制度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贯通联动，真正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体现在党的建设各个方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当前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七个重点任务，并部署了完成这七个重点任务的基本要求。七个重点任务各有侧重，涵盖了党的建设所要重点解决的各项问题；七个重点任务又不是相互割裂的孤立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我们在实践中需要根据全面从严治党的体系化要求，认真分析各方面问题存在的深层次根源，分析每一问题和其他问题之间的关系，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实施解决问题的举措。延安整风是党的历史上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成功范例。整风，就是整顿党的作风，这次整风不但成功解决了党八股、形式主义等作风方面的问题，而且成功解决了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观主义、组织建设方面的宗派主义，严肃了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保证了全党的高度团结统一。认真研究延安整风的经验，其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把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同样，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进行反腐败斗争也正是从思想教育、从严治吏、正风肃纪、完善制度等方面来解决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从而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

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要求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体现在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体现在全面从严治党各个方面，我们就必须深入研究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各个方面的深刻内涵和工作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党的建设之所以分为各个方面，从内在功能的角度讲，就是因为各个方面在党的建设整体工程推进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处于不同的地位。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落到实处，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功能才能得到更好地发挥、体系的威力才能得到更好地体现。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